

Oriental Studies

東方研究

2012—2014



北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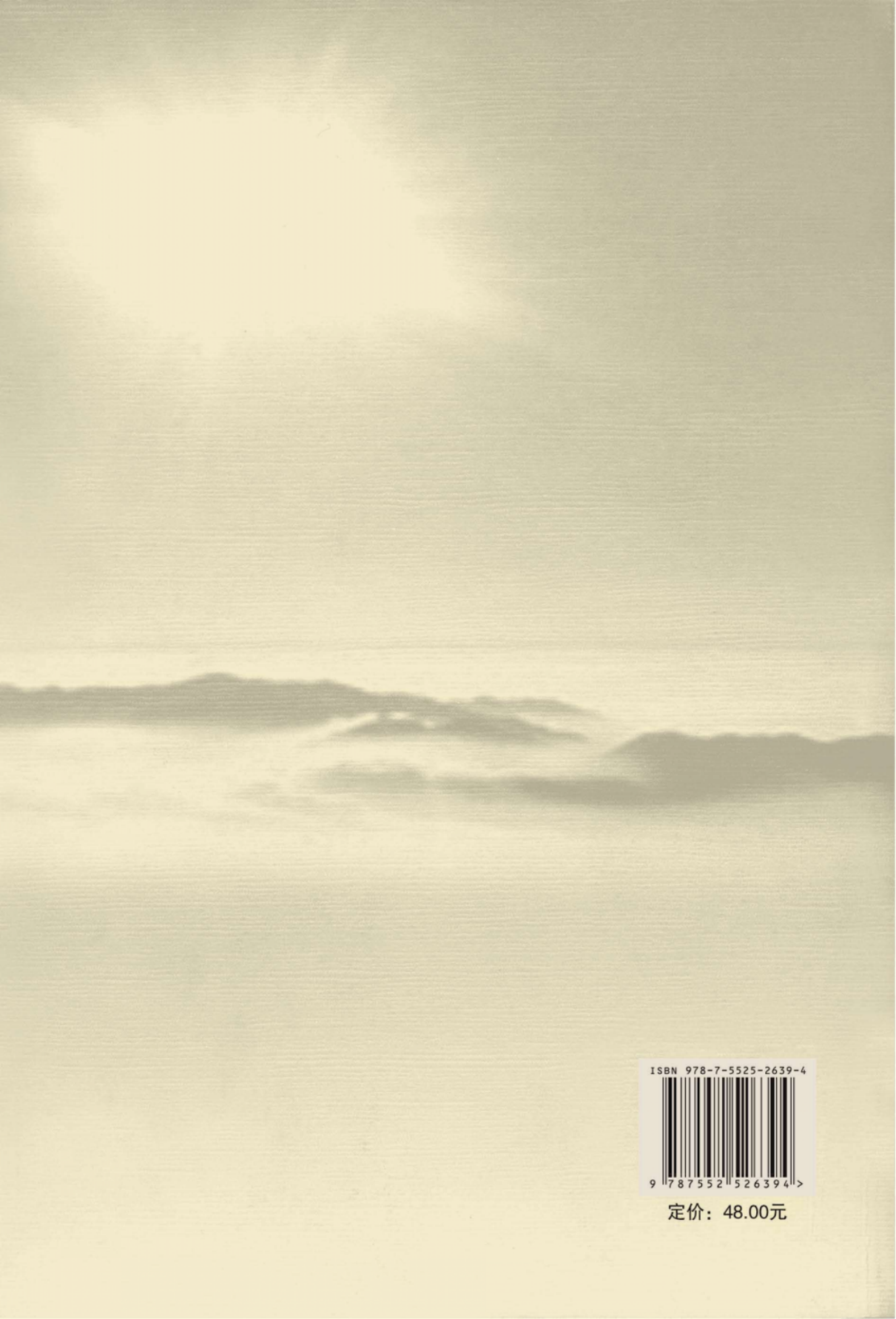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研究院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少敏
封面设计 刘锦凤



ISBN 978-7-5525-2639-4



9 787552 526394 >

定价：48.00元

Oriental Studies

東方研究

2012—2014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研究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研究. 2012—2014 /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研究院编.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525-2639-4

I. ①东… II. ①北… ②东… III. ①文化史—亚洲
—2012—2014—文集 IV. ①K30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4049 号

东方研究 2012—2014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编
东方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 李少敏

封面设计 刘锦凤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2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1334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2639-4/K·5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韩国后援会的资助，谨表谢意。

《东方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玉安		
副主编	唐孟生	湛 如	
编 委	李 强	李 政	陈 明
	姜永仁	姜景奎	蒋和平
	裴晓睿		
执行主编	岳远坤		

目 录

第一部分:东方历史与文化研究

东方学反思 王汝良 / 003

“一带一路”与东方文化 侯传文 / 017

论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陈岗龙 / 025

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对几部国外名著相关
论述的看法 贺圣达 / 038

论古代哈梯文明的起源——兼论外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在我国的
现状与反思 李 政 / 056

浅析赫梯训诫文献的归类 尹蔚婷 / 065

战后马新英文源流史学发展(1946—1965) 廖文辉 / 077

第二部分:东方宗教与艺术研究

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 贺圣达 / 103

试论印度古典舞蹈的宗教性特征 郭 童 / 120

波斯细密画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借鉴及其向印度的流传 穆宏燕 / 131

波斯译本《鹦鹉传》中的插画研究 潘 珊 / 165

秋史金正喜的绘画艺术 朴洪艳 / 176

论佛教系新宗教阿含宗对日本佛教的批判及社会文化功能 暴凤明 / 190

20世纪初韩国基督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圣经“阅读” 吴贤锡 / 205

明清时期来台汉族移民的民间宗教与族群认同的构建 ——以宗教社会学

视角考察 方柔尹 / 219

第三部分:东方语言与文学研究

刍议偈颂文体的三种复合形式 王丽娜 / 231

艾哈迈德·纳迪姆·卡斯米短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研究 张亚冰 / 241

形象与特性之别 ——古代胡里人与古代两河流域居民神话作品中的

埃阿神 蒋家瑜 / 253

试论《徒然草》中的隐遁思想 刘丽娇 / 267

上田秋成文学中的战争叙事 ——以《菊花之约》和《浅茅之宿》为例 岳远坤 / 279

日语复合格助词「について」的语法特点 马小兵 / 289

第一部分



东方历史与文化研究

东方学反思*

王汝良

【内容提要】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东方学在西方、中国的发展各有其渊源、成就和局限。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起步早、历时久、态度严谨、方法科学、成果丰富,为当下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考和借鉴,但对其局限特别是“东方主义”霸权话语也应进行批判性反思。中国的东方学发展,应梳理自身学术史,完善学科建制,实现本体论的自觉,同时,对自身学术传统进行继承和创新,对西方进行借鉴和超越,完善方法论的建构。

【关键词】东方学 西方 中国 反思

东方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东方的学问(学科)。之所以“顾名思义”,是因为东方学作为一门历史地形成、涵盖领域广泛、在东西方发展并不均衡的学问(学科),要获得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实在困难。尽管如此,众多东方文化的研究者仍试图根据各自立场为其做出一个界定,如中国的《辞海》中有如此释义:“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译解的成功,该学科有新的发展,并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专门学科。”^[1]

这个定义大致不错,对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产生背景等做出了较为符合实际的说明,保持了辞书编撰的相对客观。但实际上,东方学既有作为一种针对东方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项目批准号:11&ZD082)的阶段性成果。

[1]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的研究和作为一门系统学科的不同,也有其理论和实践在西方、东方之间的偏差。在新世纪以来东方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对这门学问进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系统的回顾和反思,为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似显必要和亟须。

作为一种针对东方的研究,西方的东方学可以远溯至古希腊时期。“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历西亚北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留下了包括《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在内的一批珍贵撰述,此后,亚里士多德也在其《政治学》中留下了对东方(主要指当时的波斯帝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最早关注。但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的确立,却是近代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标志则是近代西方大学中诸东方学科的设立,“在基督教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Church Council of Vienna)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1]。18世纪,伴随着“东方热”的兴起,东方学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涌现出一批对东方文化抱以欣赏的东方学家和为借鉴东方思想解构西方神学中心的启蒙思想家,但18世纪后期,伴随着西方对东方殖民步伐的加快,一批为殖民政策服务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也渐次出现。19世纪,“东方”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概念被普遍接受,不少学者在思考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曾将东方纳入视野,如哲学家黑格尔、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歌德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诸多关于东方社会的论断,则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国家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方的研究,使东方学出现了新的局面。东方学研究的中心从古典欧洲移至当代美国,研究重心也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基础研究转变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实用研究。1978年,美籍华裔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问世,对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和西方世界借以凸显“自我”而主观建构“他者”的“东方主义”话语机制做了辨析,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一场迄今未息的争论,也引发了关于东方学的深入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1-62页。

思考。

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起步早、历时久,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东方学家,如英国的琼斯、斯坦因,法国的商博良、伯希和,德国的贾柏莲、顾彬,俄罗斯的比丘林、李福清,等等。他们采用系统分析、实证调查、比较研究等诸多近现代科学方法,在东方的语言文字、考古发掘、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客观上促进了东方学的发展,对于他们的这些成就,应该予以肯定。其中,对东方语言文字的开拓性研究尤为显著。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进行了成功的释读,奠定了现代埃及学的学科基础,也开辟了西方的东方学家从语言文字入手研究东方的传统。此后,德国学者格罗特芬德、英国学者H.C.罗林逊和乔治·史密斯对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释读取得成功,从而奠定了亚述学的学科基础。对印度古典语言研究贡献最大的则属英国著名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他长期致力于梵语、波斯语的研究,特别是在论证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的亲缘关系方面成就卓著,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早期奠基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和德国汉学家贾柏莲对古汉语的研究也同样成就不俗,前者陆续发表于1915—1926年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被视为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滥觞之作,后者于1881年完成的《汉语经纬》至今仍为欧洲汉语学习者的必读书目。

一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也做了大量东方文化典籍的整理、校勘和译介出版工作,为保存东方文化经典、更新东方文化生命力、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威廉·琼斯于1784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牵头创建了首个西方世界对东方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组织——亚洲学会,并一直担任会长,琼斯在该学会曾发表11次演讲,均是其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涉及中国。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琼斯和亚洲学会在对东方的研究中坚持了相对客观的学术立场,对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国的文化成就予以充分尊重,并最早将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沙恭达罗》、波斯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和哈菲兹的抒情诗、阿拉伯的七首《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经典译介到欧洲。由于琼斯在东方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人们将“东方琼斯”的美誉送给了他,视其为“东方学无可争议的奠基人”^[1],亚洲学会及其会刊《亚洲研究》也成为印度学、东方学的重要译介和传播阵地。1818年,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在圣彼得堡成立,大量收藏东方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01页。

文献(其中包括珍贵的“敦煌特藏”和“黑城遗书”等)并进行校勘工作,该博物馆后发展为著名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其他于19世纪初相继成立的几个东方学研究机构也都在该领域做出了贡献,如巴黎的亚洲学会、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美国的东方协会、莱比锡的德意志东方学会等。

除以上客观的成就外,西方的东方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务实态度、所采用的科学方法也不应被忽视。他们大多通晓多种语言,视野宏阔,涉猎广泛,重视实证,态度严谨。如德国的贾柏莲为完成《汉语经纬》一著的撰写,几百页书稿、上万汉字,均一笔一画认真写就;俄罗斯的比丘林为深入了解中国现实,脱教袍,穿汉服,长期走街入市进行实地考察。务实的精神与考古发掘、实地调查、比较研究、统计分析等近代科学方法的结合,成就了西方的东方学的巨大影响。

总之,无论在历史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领域,还是在中国学(汉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日本学、东南亚学等国别或区域研究领域,西方的东方学都有着长期的积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健全学科建制、采用先进研究方法等方面,也走在了前列。但同时,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也表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西方学者对东方的考察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殖民色彩和破坏性质。如斯坦因与伯希和对敦煌文献的抢掠,虽然他们的东方探险及诸多学说对论证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建立在对新疆、甘肃、宁夏的大量珍贵文物进行发掘和抢掠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野蛮劫掠,使诸多原完好保存于流沙中的文物毁于一旦。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成就也与拿破仑入侵埃及密切相关,那块著名的罗塞塔石碑既是体现西方的东方学成就的一个标志,又是英法侵略者对东方文化进行野蛮劫掠的罪证,至今英国、法国、埃及三方仍为其归属纷争不已。比丘林前期对中国的研究,也本是为俄罗斯觊觎中国的政策服务的,他的任务就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如何看待这些东方学家的研究,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因其不正当的目的和破坏性质从而对其一概否定,还是因其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成就而忽略和消弭

[1] 江波《比丘林及其东方学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

取得这些成就的动因？显然，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对其主观动因和客观成就应该予以辩证分析、科学对待。在此方面，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作用的论断极具参考价值，他于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换言之，殖民主义者在坏事做尽的同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更多地侧重于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文化层面。面对不可回避的历史的悖论，我们认为，对如上所述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背后的殖民主义本质必须予以揭露和谴责，而对其客观成就也应予以客观对待而非一概否定。还应注意的是，一些西方的殖民主义御用学者在对东方有了切身了解和实际认识之后，果断摒弃其殖民主义立场，转而成为对东方文化予以充分尊重并加以客观研究的学者，俄罗斯的比丘林就是其中典型一例。这个沙俄政府觊觎中国的“先头兵”、“情报员”，后来却成为西方殖民理论的批驳者和“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反拨者，他主张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化，在中国学、中亚学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誉为“俄国汉学之父”。对于这类研究，更应予以客观认识和评价。

二是不少研究属“东方主义”话语机制下的产物。这也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19世纪以来，先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渐与日益贫弱的东方社会拉开差距。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主观上的偏差，他们无视东方社会文化的实际，而满足于主观塑造一个落后、野蛮、愚昧、丑陋的“他者”东方来彰显“自我”，最终为染指和征服东方进行殖民理论准备和后殖民理论辩解，这在以美籍亚裔学者萨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诸多著述中已得到深刻揭示。这与前面所重点提到的斯坦因、伯希和、商博良、比丘林等人的东方学研究又有不同：前者的研究虽然也给东方社会文化带来了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殖民色彩，但却是零散的、不连续的，没有一套系统的、完备的“东方主义”话语机制在背后产生作用，还谈不上对东方社会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整体话语霸权；而这里所说的“东方主义”，则真正形成了一整套从内在权力控制欲望到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在表述形式的“话语”力量,侧重于后殖民语境下的理论应用。对于这些具有“东方主义”意识和观念的东方学家们来说,东方不是一个本体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供主观建构、可供随意丑化的不稳定的“他者”,是一种“谋生之道”^[1]。对于这种“东方主义”话语机制下的东方学研究,自然应予以着力批判,对于这种话语机制背后的“西方中心论”,自然应予以彻底解构。这个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从开始剖析该话语机制的美籍亚裔学者萨义德(一再强调萨义德的“美籍亚裔”身份,是因为有人对萨义德基于“文化杂种”、“文化两栖人”^[2]的身份对“东方主义”所提出的质疑和批判提出“质疑和批判”),到运用和发展萨义德的观点继续对这一话语机制穷追猛打的诸多“身份纯粹”的东方学者,在这方面成果众多,无须赘述。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最突出的有: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揭示和批判虽然令人鼓舞,但其立论无疑也是基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以这种思维模式看待和处理问题,是否会偏于另外一个极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改变,且无论在政治、经济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这种改变仍在继续,那么,“东方主义”这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是否已然消失或者必将消失?这两个问题,其实都直指一个核心,那就是萨义德观点在当今世界的适用性。变化的世界需要更新的理论和观点,解构一个中心并不一定意味着建构另外一个中心,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生态语境下,更应保持清醒,对此,其实萨义德已在其著述中做了清楚的回答:“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已经通过本书使读者们明白,东方主义的答案并不是‘西方主义’。”^[3]至于“东方主义”何时消失,也不必为此大伤脑筋,它同后殖民现象一样,无法给它一个消弭的时间下限,甚至连其上限我们也无法准确把握,所

[1] 萨义德在其《东方学》的扉页中引用了本杰明·迪斯雷里在《坦克雷德》中的一句话“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并在正文中予以阐释。

[2] 霍米·巴巴曾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文化杂种”(cultural hybrid)的概念,认为在后殖民时期,各民族文化要保持其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已不可能,因为不同形态的文化处于“杂交”的态势,且由此引起的形变广泛而深刻。萨义德则说后殖民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文化两栖人”(cultural amphibians),二者有相通之处。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22页。译者在该译著中,对“Orientalism”作为一种“东方主义”观念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并未做严格的区分,只在注解中做了说明,留给读者自行判断。此处原译为“东方学的答案并不是‘西方学’”,笔者在此做了修改。

谓“后”殖民,并非完全线性意义上的殖民行为结束之后(“后”又即“反”),况且在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行为开始之前,往往已有诸多理论先行,“东方主义”便经常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所以,它一旦出现,对其进行揭示和批判即可,不管它出现于殖民之前或之后,也不管它出现于西方或东方^[1]。

三是不少研究虽无“东方主义”的明显表现,但主观上对东西文化的交流互动持悲观态度。如,不少西方学者至今仍用西方传统基督教思维审视伊斯兰教,对其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敌对态度,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建立在世界诸文明系统之间本不相容的基础之上。不但一些学者如此,不少西方作家也如此,如英国诗人吉卜林在其《东方和西方的歌谣》中曾大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二者永不会相遇”,另一著名作家福斯特在其《印度之行》中虽然对殖民主义表示了嘲讽和反对,表现出了对印度人民的同情,但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仍然表露出浓重的悲观。实际上,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异质文明之间虽时有碰撞,却并不必然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异质文明间的求同存异、交互共融,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和常态。“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2],只要真正对对方的文化抱以尊重,在此基础上进行相互间的对话与互动,一个文化多元、和谐共存的世界的到来并不遥远。所以,对各文明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主观上不应刻意夸大和抱以悲观甚至恐惧,亨廷顿后来在其著作的中文版序言中也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修正,他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3]。

此外,西方的东方学偏重对古代东方的研究,忽视对现代东方的研究。在部分西方学者眼中,东方的现代化完全拜西方所赐,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研究的,只有曾经辉煌的古代东方文明才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这样的例子更多,翻一下诸多由西方学者编撰的东方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等就可以知道了。万变不离其宗,这也是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所致,对于这类东方学研究,也应该予以判别对待。

[1] 后殖民语境下,有时东方也在这个话语机制中思考和表述自身。

[2] 《周易·系辞下》。

[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页。